

## 历史家的立足点

孙军悦

当为期三天的会议进入尾声，同行间的交流愈益融洽，专业性的讨论也越加热烈，原本应该为盛会欣喜的我却反而感到了一丝困惑。作为一个历史学的外行，之所以来旁听“国史对话”，一个重要理由是这场论坛和历史学界内部的国际学术会议有所不同，其主旨是为了在东亚各国民众之间的历史和解迟迟没有进展的状况下，思考历史家能够为此作出何种贡献。尽管学者们的发表精彩纷呈，但随着讨论的深入，话题也越来越专业，而话题越专业，气氛也就越来越热烈，几乎没有发言有意识地将论坛的内容和主旨，历史学家高度专业的研究和普通市民所面临的现实课题联系起来；历史家们的报告和讨论也几乎无法让我这个外行感受到有关700年前的历史叙述和现在之间的内在联络。这就不能不使我产生一个朴素的疑问：历史研究是否应该泯没学者自身的历史性？而感受不到学者自身历史性的历史研究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的话，这样的研究将如何与现实中民众的历史意识发生关联？在今天和未来，又将发挥怎样的现实功能？

当然，现场报告和讨论因受到各种限制未必能全面表达报告者的想法，如果仔细阅读论文，也可以从中窥见一些历史家对历史和现实之间关联性的把握。例如，有一篇论文在介绍甲午战争后所发起的建造元寇纪念碑运动的背景时写道：“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明治日本一方面要对抗欧美列强，一方面又要制定国家的生存战略。这和今天我们所处的状况不无相似。”而在提及2015年出版的以元寇为题材的漫画时指出：“漫画中象征着高科技的火药武器，同时也象征了对于时隔730年作为先进的军事大国重新在海上崛起的邻国的恐惧心理，显示了人们内心的不安”。可以说，这段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论者对现实的认识，以及把握历史与现实之间关联的角度。同样涉及明治时代和今天重提“元寇”历史的含义，为我们说明元寇史料馆由来的NPO法人志贺岛历史研究会的冈本显实先生的解说，则显示了另一种不同的视角。冈本先生明确地把建立于1904年的元寇纪念馆作为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战败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起点，并提醒我们注意1904年为鼓吹爱国主义建成的“元寇纪念馆”和战后为批判军国主义而保留的“元寇史料馆”的意义之不同，同时将发生于72年前的“今天”（我们参观元寇史料馆的日期正是8月9日）的长崎原子弹轰炸的牺牲者视为元寇纪念馆的牺牲者。冈本先生的历史知识显然属于常识范围，但他对于包括自己的发言在内的“历史叙述”这一行为本身的历史性与政治性却具有高度自觉。或许，和习惯于从国家的角度来把握历史，对历史事实及作为史料的展示品本身的真伪更有兴趣的专家不同，普通市民对历史执拗、持续的关心往往来源于现实中强烈的问题意识，他们更关注历史中民众与个人的命运，在叙述历史时首先会自问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叙述这样一段历史。

当然，历史家不能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上以现代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历史早已是学术研究公认的前提，但笔者以为，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家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必须泯却自身的个性或主体性。丸山真男在提及书写思想史的困难时这样谈到：“在写作思想史的时候，无论这种思

想的立场和观点与自己如何格格不入，都不能采取超然的态度一刀两断，而需要一度进入这一思想的内部，尽可能忠实地从内部的展望来观察体会这一思想。……在此基础上重要的是，在内在地把握了各种思想的同时，还必须使自己的立足点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思想史的叙述中，否则就会陷入这也‘理解’那也‘明白’的相对主义，无法进行真正的历史定位。”

没有“自己的立足点”或对现实强烈的课题意识也能够进行历史研究，或许是特别尊崇坚实的实证主义学风的日本近代史学的一个特质。然而，正如中世史家石母田正在战后所指出的，在史学史上留下巨大成果的历史家对具体现实的把握有时却出乎意外地贫困，在现实中也未必能发挥正面的作用，这也是近代日本史学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所以他才会批判以往的所谓“实证主义史学”只停留在史料批判技术层面的“实证”而缺乏真正的实证主义精神，是无目的、无思想、无性格的学问；并指出了成立于甲午、日俄战争期间的东洋史学所取得的卓越业绩，和其在现实中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抱以同情与尊敬，对现在和将来抱以轻蔑与绝望，试图将老大国的骨肉解剖殆尽的客观、冷峻的‘学问’态度”之间的严重矛盾。

丸山真男对“立足点”的主张，当然并不是要求先把自己的立场、观点搁置起来，通过彻底实证的研究恢复历史原貌，再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进行历史定位。如果历史家的“立足点”外在于其把握历史的整个过程，即便能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立足点”反映在历史叙述中，也不可能使其“自然而然地渗透进”历史叙述中。我以为，历史家的“立足点”应该形成于生活在现实中的历史家的内部，它不仅需要通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更需要通过在“现实”这一具体的历史场域中日夜磨练，才能作为从内部来历史性地把握所有事物现象的方法、能力和感觉，化为历史家的个性，自然而然地渗透进其主体性的历史研究和叙述的过程中。我相信，一个切切实实地在现实生活中感受着过去与现在的紧张、对未来抱有展望的历史家，不仅能够传授给我们通过辛勤劳动所获得的充满自信的历史知识，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贯流于过去和现在、未来之间的历史脉动。

在“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成立7年后的2004年，曾经出现在所有历史教科书上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记述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中消失了。直到2016年，在批判的声浪中，被贴上“极左反日”教育的标签，再次出现于一本教科书上，整整经过了12年的岁月。2017年，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一反往年惯例，拒绝在悼念关东大地震中因谣言被惨杀的在日朝鲜人的纪念典礼上致辞，理由是关于朝鲜人的“屠杀”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不同的历史书中有不同的叙述。我明白要把对时过境迁的历史现象客观冷静的学术分析和带着现实体温的主体性的历史研究与叙述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是一项多么困难的工作，然而在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难以得到政治家们充分承认的今天，历史家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多长时间被允许安心埋头于过去？严峻的现实让我不能不对历史家们抱有更高的期望。因为从历史家此时此地的历史叙述开始，未来的历史已经在悄然形成了。

中文版附记：作为一个历史学的外行，我没有能力对这场圆桌会议的具体内容发表评论。但既然这场会议并不是历史学界内部纯粹的学术交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东亚各国民众之间的历史和解，思考历史家可以为之作出何种贡献，那么就不能因为羞于暴露自己的幼稚浅

陋，而怠慢了作为一个对未来负有责任的生活于现在的普通市民的义务。这样一种历史主体意识，坦率地说，不是通过在中国的历史教育形成的，而是从日本民众那里学来的。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冈本显实先生一般，在日本有很多这样的普通市民，非常努力地把为维护人类和平的实践活动镶嵌在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历史家对于自身的专业研究和现实中政府的政策导向、民众的历史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历史认识、历史叙述和现实、未来的复杂关联具有多大程度的自觉，我以为至关重要。我真心希望以上过于直率的感想不过是无的放矢。